

# 动员、嵌入和整合:党组织引领 基层社会治理的三种机制\*

孔凡义 阮和伟

**摘要:**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依赖于一系列具体的操作性机制来实现。通过政治动员,党组织有效地激活基层社会治理资源,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动力;通过结构嵌入,党组织有效地建立起与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链接,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组织支撑;通过资源整合,党组织有效地重组基层社会治理资源,为基层社会治理赋予能量。这三种机制分别为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动力、组织和资源,是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通道。

**关键词:**党建引领 流动人口治理 服务嵌入 制度整合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22)02-0083-09

DOI:10.19624/j.cnki.cn42-1005/c.2022.02.013

近年来,中央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继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7年6月发布《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要求“探索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引领社会治理的路径”。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提升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工作水平”。2021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完善党建引领的社会参与制度”。在中央

不断强调发挥党组织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作用的背景下,各地围绕推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其中,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生动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与社会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在塑造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sup>[1]</sup>因此,中国共产党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引领”在《辞海》中释义为“带领、引导”。<sup>[2]</sup>据此,可以将“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理解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引导、带领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提升社区治理成效。党组织引

领基层社会治理,要求党组织要对外部环境的变动实时做出反馈,通过组织的功能调适,带领社区各方力量共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成效,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并夯实作为多元主体领导核心的地位。那么,基层如何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多元主体治理结构?政党逻辑与治理逻辑该如何兼容?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党组织传统的动员和整合优势后,党组织还存在哪些可以提升的空间?本文在经验层面呈现N市M街道的调研材料,以M街道采取的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作为案例进行定性研究,分析党组织动员、嵌入和整合基层社会的逻辑,以及如何通过一系列操作机制来达到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 一、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研究框架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心,如何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当前,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发受到重视。学者们对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和实践路径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多元治理主体尚未形成良性互动,多元主体在参与社会治理中表现出能力不足,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动方式有待创新。<sup>[1]</sup>从基层党建视角看,党组织激励机制不佳导致服务动力不足,基层党组织“悬浮化”<sup>[2]</sup>,党建工作与社会治理的有机契合面临挑战。对此,要树立党务服务业务的党建理念,通过“授权赋能”强化党组织贯穿基层治理,<sup>[3]</sup>促进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向“功能”引领转变,创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机制和方式。

“动员”是指发动人群加入某项活动,常用于军事领域,强调的是一种统治逻辑。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和现实条件的变化,动员的逻辑逐渐向管

理逻辑和治理逻辑转变。<sup>[4]</sup>组织动员是由党组织对党员和群众同时进行的组织和动员。<sup>[5]</sup>从动员策略看,对党政部门实行的是无差别的政治化、行政式动员,而对农民实行的是差别化的物质激励式动员。<sup>[6]</sup>中国共产党虽然从以社会动员为主导的革命型政党转型为以制度建设为基础的执政党,但执政党的制度建设仍然离不开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有效动员处于政党结构外围的组织 and 个体,是执政党有效缓解基层社会治理危机的关键,将推动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高质量的治理效能。<sup>[9]</sup>

部分学者将嵌入理论应用于党建研究。“嵌入”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最早由卡尔·波兰尼提出,即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人类交易行为的顺利完成常嵌入于长期的信任和信赖的关系当中。<sup>[10]</sup>格兰诺维特指出,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结构之中,信任是嵌入社会网络的重要机制。<sup>[11]</sup>后来的学者将嵌入理论逐步拓展到其他学科领域,从已有的研究看,嵌入理论已较为广泛地应用于党建领域。“嵌入式党建”是一种协商参与、合作治理的社区党建工作新方式,党员嵌入社区管理或服务组织,组成居民自治的集体行动单元。<sup>[12]</sup>“嵌入式治理”模式密切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基层党组织可以运用自身或社会精英掌握的组织资源,将社会纳入有序化的政治参与过程,加强对社会力量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水平。<sup>[13]</sup>单位制解体后,基层党建的“悬浮化”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脱嵌”困境同时涌现,对此,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能够实现基层党建的去“悬浮化”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再嵌入。

社区党建中党组织的协调能够打破单位壁垒,实现单位社区和社区外组织的结合,实现再组织化,解决社会治理中的成员动员、统筹协调和资源整合等问题。<sup>[14]</sup>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区党建组织网络,能够有效整合社区党

建资源,提升社区治理能力。<sup>[15]</sup>有学者针对北京的“吹哨报到”改革提出了“多层次整合”的分析框架,对于行政力量、社会力量和广大群众分别采取向内整合、向外整合和向下整合的行动策略。<sup>[16]</sup>相较于其他治理主体,小区党支部所具有的政治优势,能够将物业公司的营利目标与业委会的自治目标进行有效的整合,形成社区治理的合力。<sup>[17]</sup>商务楼宇党建应在“两个嵌入”的基础上,实现促进功能、主体、资源和平台整合的“整合型楼宇党建发展”。<sup>[18]</sup>社会组织党建是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党对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包括观念、机构和行动整合等三种基本形式。<sup>[19]</sup>

综上所述,针对当前党建与社会治理有机契合存在的挑战与可行路径,学者们从党建、基层社会治理和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三方面,提出有所侧重的理论观点,形成大量的创新成果。然而,既有研究存在着党建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未能有机统一的问题,“两张皮”现象仍然突出。鉴于此,本文从动员、嵌入和整合三者结合的视角,探讨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具体是如何实现的,为党建工作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耦合以及提升治理效能提供一个实证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 二、动员: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力激发机制及其逻辑

从单位制向现代社区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新

的制度化整合机制尚未形成,在居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不断高涨的同时,居民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的素质有待提升,脱离单位制的个体普遍呈现出“原子化”状态,居民参与度不足成为社区治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党组织引领需要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激发社区居民自治活力,为构造“一核多元”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保障。框架结构理论强调,通过集体行动文化动员以及制造意义来获得行动的价值,这对扩展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集体行动的理解大有助益。<sup>[20]</sup>

### (一)以身份动员盘活社区内党员资源

身份认同是指,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sup>[21]</sup>党员身份促进个体对身份的认同,可以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sup>[22]</sup>身份认同要求党员在同普通民众的交往过程中始终强化党员身份意识。在参与诸项公共活动中自觉亮身份,以党员的身份责任为依托,在“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实践活动中凸显党员的先进性。社区党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应充分发挥党员和居民的双重身份优势。一方面,党员要认识到自己只是社区居民中的普通一员,以居民的身份自觉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另一方面,社区党员要意识到自己不同于普通居民的党员主体身份,主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并引导所在地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培养和塑造居民自觉的主人翁意识和社区共同体意识,协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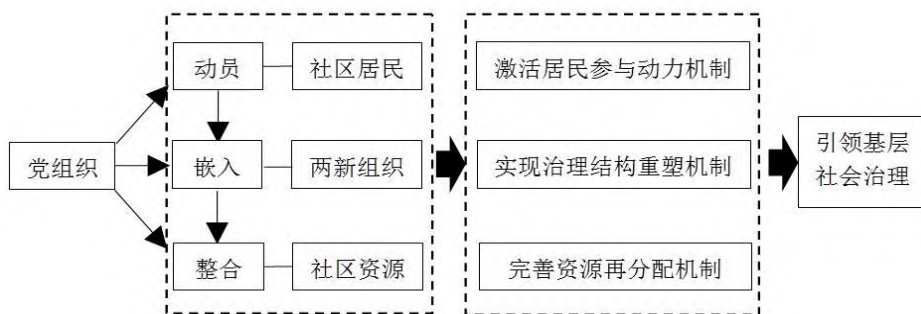


图1 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分析框架



解决当前社区治理所面临的挑战。

## （二）以情感动员激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

情感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其根植于传统基层社会对人情与伦理的重视与运用,同时在革命时期的群众工作路线和情感动员工作中进一步发展。社区中的共同体意识与集体行动并不是伴随着社区组织的建立而直接产生,群体中情绪情感的聚积与传播效应以及为群体认可的共享情感对集体行动的触发具有关键性的作用,<sup>[23]</sup>作为一种治理方法的情感动员就成为连接社区宏观结构和共同行动的桥梁。社区党组织动员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既要借助行政权威的力量,更要借助基于人情的地方性互动网络等非正式的因素,突出对非正式权威的运用,认识关系、人情等非正式的治理资源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填补技术性治理的空缺,将社区居民纳入基层社会治理的事务之中。情感动员对象包括退休党员、干部以及社区居民。社区居委会在重大节假日开展走访慰问老党员的活动,能够巩固他们与组织的联系。老党员参与社区治理主要发挥传帮带的作用,承担年轻党员的筛选和培养责任,传授群众工作和党建工作的经验,确保社区治理不因人才断档而失去工作的可持续性。同时,社区党员在回应居民关于治安、卫生环境、入学教育等方面的普遍性诉求的实际工作过程中,与其建立信任关系,提升动员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资本。

## （三）以宣传动员促进居民组织化

抗日期间毛泽东就强调“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用以达到动员人民和组织人民在共产党周围”<sup>[24]</sup>,这种宣传工作旨在塑造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以达到实现民主革命的目的。新时期宣传部门不仅发挥传统宣传、传播的功能,还逐渐承担起组织、动员和服务的功能,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宣传部门通过印发手册、媒体报道和宣传标语等形式,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社区党员扎实地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党员身份优势和调动社会资本,以聚合流散在“两新”组织中的党员以及退休的老党员,凝聚社区党员的力量。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宣传工作面临着形式与内容的创新,利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成为党和政府必须回应的时代议题,以政务微信为代表的新型宣传动员能够实现对一定区域用户的精准动员,通过朋友圈的“熟人”强关系,促使群体传播获得更好的行为引发效应,<sup>[25]</sup>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实现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这表明,网络动员对于完善社会宣传动员机制、创新社会动员的工作形式具有重要意义,吸引具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个体和社会组织的参与,有助于动员活动的顺利进行。

## 三、嵌入: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重塑机制及其逻辑

如何处理好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仍有待持续探索。以往强调党组织对社会单向控制的“政党组织社会”的路径,无法应对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新时代,党组织与社会的关系要向“政党引领社会”的逻辑转变,<sup>[26]</sup>促使党组织改变行政主导的方式,更多地引导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恰当地把握与社会组织的边界,完成“再嵌入”,破解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脱嵌”困局。社区由过去的行政主导型转变为合作共治型,既需要党组织将国家的意志与目标嵌入社会组织的运作中,也需要社会组织在合法性、资源、制度支持等方面嵌入国家,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双向赋权”<sup>[27]</sup>,实现“一核多元”协同治理。

### （一）组织嵌入重塑政治信任

社会组织在其内部主动建立党支部,自觉接纳党组织的引领,这无疑能够强化对国家意志和目标的认可,同时提升社会组织的政治信任度和

社会信任度,以便争取体制内资源,纾解社会组织的生存困难,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

### 1. 组织增能:基层党组织参与小区治理

基层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确立幅度适当的治理边界,确定精准施策的治理单元。<sup>[28]</sup>将党支部建在小区里,使党支部与治理单元一致,这为精准高效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条件。M街道蔚斗一区成立红色业委会,实行“党支部+楼组长+居民”的治理模式,每一名党员联系一幢楼,通过这样的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党群联系,将原子化的个体重新组织起来。

### 2. 以外管外:基层党组织参与流动人口治理

流动党员在党组织与流动人口群体的沟通中发挥着自身独特的功效,流动党支部成为基层政府整合流动人口参与当地社区治理的重要平台。流动党员一方面代表某一区域的老乡群体,他们与老乡们建立起了拥有情感与信任的“类熟人社会关系”<sup>[29]</sup>,他们维护老乡的利益,在处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纠纷尤其是劳资纠纷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所具有的党员身份,要求其遵循一定的原则纪律,完成党组织交付的任务,做好组织和教育宣传的工作。他们能够引导流动人口通过合法合理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改变以往时常发生的非理性讨薪现象。因此,流动党支部成为连接政府与外来人口、本地人与流动人口的纽带,为双方提供了沟通平台。流动党支部在为流动人口解决实际困难、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逐渐树立自身的威信,这为进一步开展各项公益和文化活动、促进社区融合、引导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提供了有效前提,以最终实现流动人口参与社区自治、聚集乡贤能人践行德治的良好局面。

## (二) 服务嵌入重塑党群关系

政党意图柔性地“嵌入”社会组织,获取社会

组织的认可,就必须根据社会组织自身的需求开展党建与服务工作,在服务的过程中向社会组织展示党组织不可或缺的地位,实现党组织功能的发挥和扩张,进而建立起党组织与社会组织紧密共生的关系。党组织嵌入小区与楼栋之后,为居民提供服务,解决他们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困难,实现党的功能与居民的日常生活联结,拉近党群的距离,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党组织的力量。党组织除了对居民日常生活常见问题予以回应外,还应构建超前于社区日常工作的长远议题,推动社区治理工作具备持续的内生动力。

### 1. 以服务对接吸纳流动社会

党组织要发挥引领基层社会的作用,需要探寻党组织对接基层社会的连接机制,为政党功能发挥提供依托。党支部既要发挥内部动员服务体系“党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党小组”的优势,也要完善党连接社会的“党支部-楼组长-居民”以及“流动党支部-乡贤代表-居民”对接机制。一方面,党支部可以实现高效的内部动员,调动党员服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党支部与基层社会对接,将实现党组织的影响力融入基层社会。在这种服务机制中,支部功能的发挥直接影响着政党融入基层社会并引领社会治理的效能。

### 2. 以“创造性劳动”耦合认同机制与效率机制

德里昂以“耦合”为核心概念,对“政党塑造社会”进行理论阐释,认为“耦合”使得哪些矛盾和差异转换为具有意义的身份认同和集体行动的基石,不是被提前预设好的,而是要取决于政党的“创造性劳动”。<sup>[30]</sup>各类社会组织发展迅猛,活跃在各个领域,发挥着利益聚合和表达的功能,可是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的现状,使得社会组织的合法性面临着一定困扰。因此,在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持续互动中,将党组织嵌入社会组织中以赋予其合法性,在不同的议题中创造性地建立

起联系,以实现合法机制与效率机制的耦合,是激发社会组织党建内生动力的一条可行路径。

### 3.以公共空间提升社会资本

社区公共空间是党组织、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现实活动场所,也是承载社区独特精神文化的重要场所,具备自然和社会的双重特征。<sup>[31]</sup>公共活动场所体现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和为民服务的价值内涵,能够吸引不同的社会阶层尤其是城市新移民参与公共活动,增强个体之间的联系,满足公共文化的需求,提升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M街道流动党支部依托N市积分落户政策,成立“五四乡帮”志愿服务团队,吸纳流动人口承担社区交通疏导、夜间治安巡逻和垃圾分类等社区公益活动,在减轻基层政府工作负担的同时,极大促进了流动人口群体与本地居民融合。

## 四、整合:党组织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资源再分配机制及其逻辑

步入后单位与信息化时代,新的制度化整合机制仍在探索当中,社会存在着一定的碎片化和失范化。基层社会治理涉及组织建设、权力重构、制度建设等多个方面,党组织有必要进行整合,控制诸种离心的倾向,解决由于政府、市场和社会分化带来的冲突。在非同质的结构中,高度整合、位于中心点位的党组织被赋予重要地位,能够对不同治理主体的利益冲突进行裁决,调整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形成各个治理主体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动态均衡的局部秩序,不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革新。党组织对治理主体的整合程度,取决于基层社会治理环境的特征以及这种环境对党组织提出的挑战。无疑,党组织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和工作交流沟通机制,能够显著改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服务重复供给以及服务供给

不足的弊端,对社区公共服务网络进行协调整合,弥补权力导向的行政治理逻辑、经济导向的市场治理逻辑以及公益导向的社会力量治理逻辑的不足。

### (一)组织整合:健全一核多元的治理领导机制

由于科层制行政体制条块分割的弊端以及社会各主体间协作存在的壁垒,政府治理要素之间、社会治理要素之间以及政府治理要素与社会治理要素之间存在裂隙,这亟须具备相应政治地位和功能的党组织整合政府治理要素和社会治理要素。在纵向上推动“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层层抓落实,统筹谋划,体现党组织内部整合能力。在横向上完善合作治理机制,动员党组织、基层政府、社会组织、营利组织共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协作不是预先制定好的,这种集体行动建立在对社会治理环境的充分认知上,表现为基层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和利益诉求。而党组织通过“元治理”,推动三种治理主体在保持一定自主性的同时相互嵌入,统筹兼顾各方主体的利益和资源,寻求利益的交汇点和均衡点,达成各方可接受的共识、行动规则,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M街道通过持续建立和培育红色业委会、流动人口党支部、企业党支部,最终成功实现对居民、流动人口和企业职工的再组织化,促使各类市场和社会组织成为党和政府推动社会治理和加强社会整合的重要资源。

### (二)权力整合:塑造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格局

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权力结构由单一的政治行政权力向“国家-市场-社会”的多元权力结构转变,市场力量和社会组织迅速兴起,经济领域权力和社会领域权力日益上升。<sup>[32]</sup>权力格局的演



变要求社会治理的方式相应革新,倘若未能及时对权力主体的地位和权力结构作出相应回应,固守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就会引起权力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社会治理的失范,进而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吸纳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赋予社区更多的自主权,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和自组织水平,有利于形成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权力格局。值得注意的是,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不是简单的权力下放,社会力量壮大的前提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减少行政干预,权力和强制是内在于任何社会的,基层社会治理更多的是一个制度建设的过程,而非解除限制的过程。政府需要废除束缚社会力量进一步成长的规制,同时更需要增强规制能力和社会制度建设,这在更深层次涉及党组织应创设机制以协调不同治理主体的权力关系和分工。在物业公司撤离小区后,M街道蔚斗一区红色业委会以党建整合,发挥小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联动小区能人与活动积极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由此,红色业委会成功实现了对物业公司的功能替代,充分运用有限的治理资源实现了小区的“微治理”,有效提升了小区公共服务的供给和社会矛盾的化解。

(三)制度整合:破解基层多元共治合法性困境

制度性整合强调“扩大参与体系”,赋予社会成员政治身份和参与空间,要求国家运用政策、法规和法律等制度性的手段,对各种社会力量进行统合,使其运行符合一定的秩序和规范。<sup>[33]</sup>社会事务的复杂性和地区间发展的差异性,导致国家立法难以针对性地供给基层社会治理,而内生于社会本身、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规范,可以改善国家正式制度在微观实施领域的操作性、整合性和回应性的不足。不同于依靠立法的政府治理制度资源,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资源必须与当地风俗习惯相适应,这主要依靠一定的社会规

范。这些社会规范的制定、执行与实施,体现了基层社会共同体内部成员的共同意志和价值认同。故而,要重视那些行之有效的习惯和规则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所发挥的规范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共同体成员所确立的社会规范应与国家法律的立法精神保持一致,党组织引领的多元治理力量显然能够有效防止“小共同体”本位主义侵害国家整体利益。对于地方社会规范所能调整的基层事务,党组织应充当最终的矛盾调解者的角色,党和国家力量不轻易“进场”。而对于基层民众在社会治理中大胆试、大胆闯所取得的非正式制度创新成果,党组织应敢于为其背书,并推动其中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地方立法,促进制度供给的上下互动。在物业退出蔚斗一区后,在街道和社区党委的支持下,蔚斗一区在逐步摸索中形成了“红色引领+居民自治”的治理模式,为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探索新路径。

## 五、结论与讨论

社区治理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作为国家与社会连接交汇的基层场域,社区成为调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缓冲地带。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亟须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能够统合各方力量,实现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协同治理格局。在这种治理模式下,政党由传统“组织社会”的逻辑向“引领社会”的逻辑转变。党组织功能的扩张与发挥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始终明确自身服务型角色的定位。在新的历史阶段,党组织对基层社会力量的引领,要求其在领导观念、工作模式和行为方式上主动调整,主动塑造社会,将基层社会组织的诉求与基层党建工作“耦合”,培育和发展新时期

的动态比较优势。通过动员体制内外力量,激发社区中党员和居民参与治理的活力;通过组织和服务的柔性嵌入,有效地建立与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链接,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组织支撑,形成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共振效应;发挥基层党组织居间关系链接,整合社会治理要素,与其他治理要素相联系,实现小区的“微治理”,并将社会组织引导至国家政策倡导的路径中,使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的治理效能。

.....

#### 注释:

- [1][17]韩冬雪、胡晓迪:《社区治理中的小区党组织:运作机理与治理效能——基于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行政论坛》,2020年第3期。
- [2]夏征农:《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377页。
- [3]陈东辉:《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与路径》,《理论与改革》,2019年第3期。
- [4]陈亮、李元:《去“悬浮化”与有效治理: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逻辑与类型学分析》,《探索》,2018年第6期。
- [5]姜晓萍、田昭:《授权赋能: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新样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 [6]蔡志强:《社会动员论——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45页。
- [7]吴晓林:《党如何链接社会:城市社区党建的主体补位与社会建构》,《学术月刊》,2020年第5期。
- [8]邓万春、黄璐璐:《乡村振兴的动员机制与模式:整体党委动员与差别化动员》,《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 [9]符平、卢飞:《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脱贫攻坚的组织动员》,《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3期。

- [10](英)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91~110页。
- [11]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 (3):481~510.
- [12]孔娜娜、张大维:《嵌入式党建:社区党建的经验模式与路径选择》,《理论与改革》,2008年第2期。
- [13]程熙:《嵌入式治理:社会网络中的执政党领导力及其实现》,《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1期。
- [14]王杨:《单位社区再组织化的网络建构逻辑——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的案例研究》,《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 [15]杨妍、王江伟:《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实困境、实践创新与可行路径》,《理论视野》,2019年第4期。
- [16]张勇杰:《多层次整合:基层社会治理中党组织的行动逻辑探析——以北京市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为例》,《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6期。
- [18]周俊、徐久娟:《从嵌入到整合:商务楼宇党建新发展——基于上海市H镇的实证分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 [19]崔开云、徐勇:《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问题分析——基于观念、机构和行动的综合性视角》,《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6期。
- [20]刘杰:《框架构建、身份认同与激情政治:集体行动研究中的文化范式》,《江海学刊》,2017年第5期。
- [21]张淑华等:《身份认同研究综述》,《心理研究》,2012年第1期。
- [22]鲁元平等:《身份的幸福效应——基于党员的经验证据》,《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9期。



- [23]赵欣:《社区动员何以可能——结构-行动视角下社区动员理论谱系和影响因素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8页。
- [25]郭泽德:《政务微信助力社会治理创新——以“上海发布”为例》,《电子政务》,2014年第4期。
- [26]田先红:《政党如何引领社会?——后单位时代的基层党组织与社会之间关系分析》,《开放时代》,2020年第2期。
- [27]纪莺莺:《从“双向嵌入”到“双向赋权”:以N市社区社会组织为例——兼论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浙江学刊》,2017年第1期。
- [28]邓大才、张利明:《多单位治理:基层治理单元的演化与创设逻辑——以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单元演化为研究对象》,《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5期。
- [29]刘超、虞崇胜:《农民工党建:流动人口治理模式创新研究》,《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12期。
- [30]张跃然:《反映社会还是塑造社会?——国外

社会学讨论“政党-社会关系”的两条路径》,《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3期。

[31]高万辉:《新型城镇化下的大城市边缘社区公共空间价值探讨》,《经济地理》,2016年第9期。

[32]张广利、徐丙奎:《权力、治理与秩序:一个可能的社区分析框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0期。

[33]吴晓林、戴昌桥:《政治整合研究:概念逻辑、问题论域与研究展望》,《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集体行动的政治心理机制及其调适研究”(项目编号:16BZZ007)。

作者简介:孔凡义,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2;阮和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3。

(责任编辑:杨瑜娴)